

【论 文】

“纯洁”还是“混合”

——近代汉人学者的“民族史”写作*

常 宝

摘要：族群文化西方与世界各地“民族史”的著述及其发展几乎与“科学史学”的兴起同步进行。“民族史”写作与科学史学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不同国家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等诸多因素。近代中国汉人学者的“民族史”，其实质既是民族主义“史学”，也是科学主义“史学”。大部分学者有强烈的汉人民族主义和革命情绪，主张改写汉人“民族史”，而一部分学者始终坚持各民族“种族”与“地域”上的“混合”与“统一”的观点，成为后来学者所继承的遗产，对近代与当代国家和社会建构产生了影响。

18 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民族主义，使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连成一片的世界格局趋于分散，世界不再是大家庭，民族和民族主义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写作，中断了“世界史”(world history)或者“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的延续，以西方近代史学为楷模的民族史写作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出现了“民族主义史学”。被誉为“科学史学鼻祖”的德国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其学术生涯也以“民族史”、“国家史”的写作为主。受到西方史学的影响，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史学家在改造传统史学的时候，也主要尝试写作“民族史”，但其目的则往往是激发民族感情、抵御西方的侵略。于是，民族主义史学成为近代史学的主要模式，虽然后来对民族主义史学的批评也不绝于耳。本文，将以中国近代汉人学者“民族史”写作为例，探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史学的各种表现形式，揭示史学近代化的多样性，主要以近代中国汉人学者所撰写的几部“民族史”为对象，简略分析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过程与衰竭倾向。

一、科学的发展与民族主义的兴起

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民族-国家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新兴资本主义集团通过与皇室、教派的联手，获得了政治与宗教的独立权，并开始进行海外扩张。这些种种变革的结果，促成了民族主义的兴起，为了建造民族-国家，培养民族主义的感情势在必行，从而历史写作改变其形式和内容。在欧洲，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便已有史学家写作了《意大利史》，以后各国的史学家都有所效仿，出现了类似的“民族史”和“国家史”。

随着宗教改革、科学思想的发展和世俗主义的盛行，人们不再轻易相信古代、中世纪史学中所记载的各种神话传说和宗教奇迹，希求从确切的史实出发，重建真实的过去。自文艺复兴以降，欧洲人文主义的学者已经在版本考订、鉴别文献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于是，历史写作自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在 18 世纪以后，开始出现重要的变化，史学写作逐渐形成了“科学化”倾向。

史学风格的转变和对历史真实的追求看似客观、公正和中立，但其背后充满了实际需求和功利性目标，即为了服务于民族-国家的构建。于是，在史学写作上，“科学化”和“民族化”同时出现。被人们称作为“科学史学的鼻祖”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就一方面否定他的德国同胞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认为黑格尔的描绘歪曲了历史事实，历史并没有那样固定的演化规律。

* 本文原刊载于《中国人人类学评论》第 19 期(2011 年 6 月)，第 58-71 页。



但另一方面，他又坚持认为在历史走向近代的过程中，民族-国家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坚信民族-国家在近代历史上置于重要地位，则在他的史学研究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这样的观念和做法，与当时的欧洲形势和世界政治格局息息相关。从17世纪直到20世纪上半叶，民族-国家的兴亡和各个国家之间的争权夺利一直是世界历史的主题。包括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在内的史学家发起的欧洲所谓“古学运动”（antiquarian movement），其目的是重建过去，展现自身民族的辉煌历史，提升民族意识，而且那些历史学家在民族-国家建构时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前所未有的。他们都认为“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主张“个人应服从于国家”。

二、民族主义与中国近代民族史

欧洲的科学发展与民族主义的兴起直接影响和促使了东亚帝国的近代化与民族主义的出现，也决定了史学的转变和“民族史”内容。民族主义传入东亚和中国以后，迅速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用来抵御欧美强权侵略的理论武器。与此同时，来自东亚各国与中国传统的反自由主义的倾向，在清末民初的中国，也有清晰的表现。

近代中国汉人思想家、知识分子精英接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在“治国”“治民”观念和理论建构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风格和提倡，特别是在历史的撰写与史学理论上逐步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讨论主题。其中，汉民族是“纯洁”的群体还是“混合体”的讨论始终贯穿了近代史学体系，成为“民族史”的争论焦点和核心议题。此争论和议题自然涉及到“科学”“启蒙”与“民族主义”的范畴，可用“科学”与“民族主义”概念和因素加以解释。

“民族史”的写作过程，是历史上的学者和精英们的民族主义和政治立场的集中体现。在20世纪20、30年代，在汉人精英、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不同形式的民族主义倾向和意识形态，随之，在“民族史”的写作方面也出现了不同风格的意识和民族观的表现。

（一）梁启超与《中国史叙论》、《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及《中国历史研究法》

20世纪初的中国，有关汉民族起源的论说喧闹一时，尤其主张中国民族“外来之说”煽惑极盛。1906年梁启超（1873-1929）写就《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在其中就提出了自己的独特思考和观念，他认为：“我中国民族，即所谓炎黄遗胄者，其果为中国原始之住民，抑由他方移植而来，若由移植，其最初祖国在何地，此事至今未有定论。”¹ 并列出了其所关注和欲研究的一系列问题，即：“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自初本为一民族乎，抑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乎，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一问题。若果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则其单位之分子，今尚有遗迹可考见乎，其最重要之族为何为何，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二问题。中华民族混成之后，尚有他族加入，为第二次，乃至第三四次之混合否乎，若有之，则最重要者何族何族，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三问题。民族混合，必由迁徙交通，中国若是初有少数民族，则其迁徙交通之道，有可考见乎，此吾所欲研究之第四问题。迁徙交通之外，更有他力以助长其混合者否乎，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五问题。迁徙之迹，限于域内乎，抑及于域外乎，若及于域外，其所及者何地，其结果之影响若何，此吾所欲研究之第六问题。……中华民族，号称同化力最大，顾何以外来之族多同化于我，而我各省各府各州县，反不能为完全之自力同化，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七问题。自今以往，我族更无求以进于完全同化乎，抑犹有之乎，若有之，其道何由，此吾所欲研究之第八问题。”²

梁启超1921年在南开大学演讲，之后将此讲稿命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在该演讲中，梁启超对“史之意义”进行解释：“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

¹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合集·专集之四十一。

²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合集·专集之四十一。



则曰中国史。”¹ 这里，梁启超的民族史学观念呈现得淋漓尽致。

梁启超从当时的国家利益和中国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与现实出发，运用世界视角，在著作的多处阐释了他对民族问题的一系列见解和观点，可能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运用科学观点和进化理论方法研究和讨论中国民族史学的思想者，对 20 世纪民族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梁启超的核心观念是，主张以汉族为主的多元融合的民族史学研究视角。梁启超早在 1901 年在他《中国史叙论》中已谈到中国境内民族来源的多元性，强调汉族也不是出于一祖。1906 年，梁启超明确提出：“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² 他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再次指出“我中华民族本已由无数支族混成，其血统与外来诸族杂糅者亦不少。”³ 他通过大量考察，并经过反复论证，对汉族发源地和其他各民族迁徙、流动和演变规律得到了比较完整的结论，认为：“臆推我国各地区原始时代所有民族之大概”：“大抵诸族之起，非沿大江，则缘大湖。黄河流域，则有我中华民族焉，洞庭湖、鄱阳湖及扬子江中游灌域，则有苗族焉，岷江灌域，则有蜀族焉，嘉陵江及扬子江上游灌域，则有巴氏族焉，淮水灌域，则有徐淮族焉，两江灌域，则有百越族焉，滇池及洱海灌域，则有百濮族焉。”⁴ 这些结论基本符合之后历史学、考古学所发现的结果。这种观点打破了历史以来汉族所拥有的优越感，在理论上否定了传统的“汉族一元论”。

在历史上各民族交流过程中，梁启超特别注重汉族同化其他民族的现象，将汉族同化诸异族所用的程序归纳为：“1. 诸异族以国际上平等交际的形成，与我族相接触而同化；2. 我族征服他族，以政治力使其逐渐同化；3. 用政治上势力，徙置我族于他族势力范围内；4. 我族战胜他族，徙其民入居内地，使濡染我文明；5. 以经济上之动机，我族自由播殖于他族之地；6. 他族征服我族，经若干岁月之后，遂变为文化上之被征服者；7. 他族之一个人或一部族，以归降或其他原因，取得中国国籍；8. 缘通商流寓，久之遂同化于中国。”⁵ 梁启超依然坚持以汉族为中心的历史分析法，认为汉族在历史上发生的多族融合过程中始终占据了核心地位。

（二）傅斯年与《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傅斯年（1896-1950）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是他“民族史”的代表作。其中他认为殷人发源地在渤海周围，“相土烈烈，海外有载”，相土是商代甚早之先王，海外即指渤海。正当傅斯年撰写此书时，日寇在东北发动“9.18”事变，占领东北地区，并宣扬东北地区并非中国领土。傅斯年为驳斥日本人谬论，特地撰写《东北史纲》，并用大量资料证明“殷代祖先起自东北方向”。在他以后的史论和文章中多次阐述中华民族多源一体理论，论证先秦中国各地有些不同的民族，经过殷周两代政治文化发展，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秦汉以后成为一体的具有高度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中华民族。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是傅斯年先生生前未能完成的一部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专著，对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发展进行了初步探索，并在以后研究中继续发展中华民族多源一体的理念。据他自己说，至民国二十年（1931年）夏，该书“写成的将三分之二矣”。他在《夷夏东西说》的前言里说：“这一篇文是我在‘九·一八’以前所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的三章。这一书已成之稿，大致写在‘九·一八’前两年至半年间。这三章是（民国）二十年春天写的，因时局影响，研究所迁徙两次，我的工作全不能照预定呈规，所以这一书始终不曾整理完。”⁶ 由

¹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3页。

² 梁启超著，吴松、卢云昆、王文光、段炳昌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1680页。

³ 梁启超著，吴松、卢云昆、王文光、段炳昌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3213页。

⁴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合集·专集之四十一。

⁵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2页。

⁶ 傅斯年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页。



于日帝侵华，加之“公私事纷至，继以大病”，傅斯年未完成《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的写作，但从该书中清楚地感受到傅氏民族观的大致轮廓及厌恶和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情绪。

《夷夏东西说》和《周东封与殷遗民》均是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的重要章节。《夷夏东西说》开头一段就已提到：“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¹在《夷夏东西说》的“总结上文”部分中他又说：“我们可以综合前几章中所论的结果，去讨论古代中国由部落进为王国（后来又进为帝国）的过程中，东西对峙的总结局。”²至此，对中国历史上国家性质的演变和不同势力对抗过程做了一些定论。另外，《姜原》、《大东小东说》、《论所谓五等爵》，无论从内容上看或从写作时间上看，大约都是《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的一部分。

傅斯年的观念和对中国历史分期方法与其他史学家截然不同。傅氏认为：“中国史不仅必须是民族主体的历史，而且这个民族主体必须是汉族。正是汉族的命运应该决定我们对各个历史时期的理解。”“中国历史的断层不是秦朝的中央集权，而是发生在公元4世纪魏晋结束之后的西晋时中原为胡人所占据。傅氏断言在此之前的两千多年汉人一直保持了其纯洁性。”³他认为魏晋以后则是胡汉在血缘及文化上的混合。“傅氏把这一时期称为‘第二中国’。他暗示‘第三中国’兴起于民国，但不很明确。……这里历史发展的范畴本身似乎与民族主体的建构联系在一起。”⁴傅斯年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对中国民族研究和“民族史”写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三）顾颉刚与《古史辨》

顾颉刚（1893-1980）是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最卓越的汉族历史学家。他揭示正统儒家学说的叙事掩盖了其他叙事，挑战汉民族“纯洁”性，并高度评价异族与异文化的重要作用。顾颉刚提出了“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⁵的著名论断，并因不遗余力地剖析民族主义的历史神话而遭到国民党的非难。他试图通过打破汉族纯洁性神话的方式来改造中国历史叙述结构本身，而且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最有创造力的时期正好是社会变迁、混乱、竞争激烈的时期，中央集权的政治一统和儒教的制度化恰恰造成了压抑和衰败，正是由于外来者和边缘居民周期性地给予中华文化以活力，才使得中华民族延续下来。

顾颉刚受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整理国故”思想的影响，从20年代起即从事中国历史和古代文献典籍的研究和辨伪工作。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点和视角，吸收近代西方社会学、考古学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顾颉刚与钱玄同等发起并主持了古史辨伪的大讨论，又广集当时的研究成果编成《古史辨》八册，形成了“古史辨”派。顾颉刚在其六万多字的“自序”中从时势、个性、境遇等方面畅言自己所以有“古史层累地造成”这一见解的原因以及“依据各时代的时势来解释各时代传说中的古史”⁶的研究方法，引起了后人的关注。他认为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周代时最古的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朝有三皇，汉代以后有盘古，古史系统的形成，主要出于战国到西汉的儒家之手。他以“疑古辨伪”的态度考察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否定了儒家利用六经（尤其是利用《尚书》）编成的整个古史系统。他又提出，必须打破中国古代民族只有一个、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以及古史人化、古代是黄金时代等观念。

顾颉刚先生又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实地调查、访谈，如1934年的绥远考察和1937-1938

¹ 傅斯年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页。

² 傅斯年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3页。

³ [美]杜赞奇著，王宪明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6页。

⁴ [美]杜赞奇著，王宪明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7页。

⁵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年，“自序”，第29页。

⁶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年，“自序”，第36页。



年的西北教育调查,进一步认识到中国诸民族在种族、地域关系上的复杂性和统一性,发表了《我们为什么到西北去》、《如何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西北回民应有之觉悟及其责任》、《中华民族是一个》、《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及“续”)》、《中国边疆问题及其对策》等诸多文章,分析了中国历史上多民族之间的关系和互动过程,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

(四) 王桐龄与《中国民族史》

王桐龄(1878—1953)的《中国民族史》最初版本由文化学社在1934年出版。据马戎教授介绍:“王桐龄先生的《中国民族史》全书原计划共分为上下两编(‘内延史’和‘外延史’),分别叙述‘中国民族对内融合事迹’和‘中国民族对外发展事迹’。”¹ 20世纪90年代,上海书店编印《民国丛书》,王桐龄先生的《中国民族史》与吕思勉先生的《中国民族史》(1934年世界书局出版)同编入该丛书的第一编第80卷(历史、地理类)影印出版。2010年4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编辑《民国学术丛刊·历史编》,将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作为丛刊之一,重新出版。

王桐龄先生的这本《中国民族史》是以历史分期为章节,在各历史时期分析各民族的交往历史进程。换言之,这本书以历史分期来划分各编(章),在各编(章)中分别叙述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与演变过程。因此,可认为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是一部中国民族交往史。

王桐龄先生对于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以汉族为主体,把汉族发展的全部历史划分为一个胚胎期、四次大蜕变和四次蜕变之间的三个修养期。王桐龄在文字叙述中并没有大量引用古代文献关于各民族的文字记载,而是把文献中有关民族融合的资料(通婚、改名、改姓、吸收外族做官、外族归化等)汇集成表格,这些表格几乎占据了所有篇幅,同时作者通过零星星的文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王桐龄先生1934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史》影印本共680页,2010年重印版《中国民族史》共582页,除序论和结论外,全书分为八章,分别论述了划分为八个阶段的中国历史民族交往过程,即(1)汉族胚胎时代(太古至唐虞三代);(2)汉族第一次蜕化时代(春秋战国);(3)汉族第一次修养时代(秦汉);(4)汉族第二次蜕化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5)汉族第二次修养时代(隋唐);(6)汉族第三次蜕化时代(五代及宋元);(7)汉族第三次修养时代(明);(8)汉族第四次蜕化时代(清)。各章节引经据典,详细地介绍了历史上各民族、部落融入中原以及边疆各个部落被中原文化同化(汉化)的过程。全书八章的主要内容,都紧紧围绕着民族交往与民族融合这个主体和主线。本书最大的特点,即是在每章的“附录”部分以表格的形式详尽地开列了从历史典籍中查找出来的有关各民族“接触”事件、跨境移民、“归化部落”、以及各朝代皇族中的族际通婚(后妃族属、公主宗女下嫁)、朝臣族属、朝臣更改异族姓名等等的情况,书中共有这样的表格约161个,另外还有反映各朝代皇族的族属世系表68个。每个表格中每个具体人物,都注明其姓、名、家世、族属、官爵、资料出处等。

王桐龄先生提出: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些边远民族与汉族较易融合具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血统接近,……故同化较易”,二是“诸族起源地,除去北狄、西戎以外,皆在河流近旁。……地势偏南,气候较为温暖,雨量较为丰盈,交通较为便利,故容易进化成为农业国。秦汉以后,此一方之人民,遂同汉族混合,不再分立矣。”²

这里讲述的“同化”或“融合”的基础条件为两个,即“血缘”与“文化”。在各族相互同化、融合的过程中,他们之间血缘之远近程度是最为重要的因素。王桐龄的研究得出结论:“东夷一支与汉族血统接近,吴越、荆楚二支血统,界乎汉苗两族之间,蜀族血统界乎汉藏二族之间,

¹ 马戎,“从王桐龄《中国民族史》谈起——我国30年代三本《中国民族史》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² 王桐龄著,《中国民族史》,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16页。



庸族血统界乎汉苗藏三族之间，故同化较易。群蛮为苗族直系血统，闽与瓯越、南越三支为苗族旁支血统，巴族血统界乎苗藏二族之间，西戎为藏族，北狄为满蒙二族之混血族，故同化较难”¹。

在自然条件下形成的经济类型和文化特点也是“同化”过程中的重要因素。汉族的农耕技术和农业社会组织在当时东亚大陆上确实最为发达的。在这个前提下，从事粗放农业、畜牧业、狩猎采集业的其他民族不断推崇和学习精耕细作的农业文化，接受了汉文化，从而逐渐融入汉族。

王桐龄先生这本书最终核心的观点是，认为中国各民族经过几千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实际上已成为血缘混合的群体。他写道：“实则中国民族本为混合体，无纯粹之汉族，亦无纯粹之满人。”² 当王桐龄在中国民族集合体这一层次上进行分析时，他提出“中国人民为汉满蒙回藏苗六族混合体”³ 这一观点。

王桐龄先生不仅将历史以来的汉人、汉族视作为各民族“混合体”，也将周边的部落和少数民族确定为“混合体”，认为甚至在远古时代，这些部落、民族就是不同民族的“混合体”，如汉族在其“胚胎期”是四支部落（炎帝、黄帝、周、秦）的血缘混合体，而春秋战国时期的“獯鬻”则是通古斯和蒙古两支血统混合后变成的一种“新民族”⁴。

（五）林惠祥与《中国民族史》

林惠祥（1901-1958）先生言道：“欲求明了中国各民族过去之史实不能不先理清其种族之分类。”⁵ 他采用“双重分类法”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进行分类叙述，并阐明“现代之民族谓之族，历史上为之系”，根据此种分类方法把中国古代的民族分为16个系和黑白两人种。林惠祥先生注重在中国历史上民族间相互融合的观点，并将历史民族与现代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定义为“历史上一民族常不止蜕嬗为现代一民族，而现代一民族亦常不止为历史上一民族之后裔。”⁶ 在林惠祥看来，“秦併六国统一于华夏，……自上古以来之异族凡在域内者除南蛮及西南夷外大都同化于华夏系。”⁷ 从林惠祥的研究中看到，中国古代“系”与现代“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演变、同化过程的基本脉络（见下图：中国民族系统表）。

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是他史学观与民族观的大集成。从该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多族之间的交流和互动的结果，华夏系与现代民族都有关联，东夷系还与满洲族有关系。在东夷蜕变同化于华夏系后，华夏系虽然成为汉族的主干，但是汉族并非是华夏系一系后裔，而是由众多族系融合而成的。

林惠祥不仅从各民族内部特质演变、转移的角度分析民族发展问题，也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出发，探讨与研究民族之间的交往。他指出：“中国民族史为叙述中国各民族古今沿革之历史，详言之即各族而讨论其种族起源，名称沿革，支派区别，势力涨落，文化变迁，并及各族相互间之接触等问题。”⁸ 至此，他对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理解就是各民族间相互接触和混合。

从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一书中所阐述的古代民族关系和交往模式可归纳为以下几种，并可找到相应的例子：

¹ 王桐龄著，《中国民族史》，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16页。

² 王桐龄著，《中国民族史》，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序论，第1页。

³ 王桐龄著，《中国民族史》，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结论，第576页。

⁴ 王桐龄著，《中国民族史》，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15页。

⁵ 林惠祥著，《中国民族史》[上]（内部发行），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1页。

⁶ 林惠祥著，《中国民族史》[上]（内部发行），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8页。

⁷ 林惠祥著，《中国民族史》[上]（内部发行），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27页。

⁸ 林惠祥著，《中国民族史》[上]（内部发行），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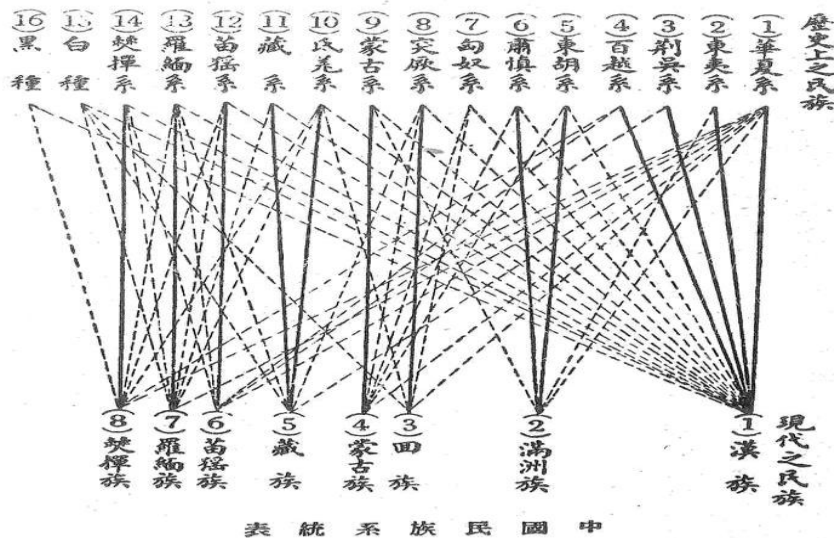


图 中国民族系统表

资料来源：林惠祥著，《中国民族史》[上]（内部发行），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9页。

(1) 战争。“高车至后魏时与蠕蠕即柔然为敌，亦常侵魏，魏太祖亲征大破之，徙其众于漠南。其后高车各部酋长陆续降魏，且就魏食，其他诸部仍散处北方然不能为患也。”¹

(2) 和亲。“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诏江夏王道宗持节护送，筑馆河源；”²

(3) 改姓。“唐亡后土蕃亦分裂不复振。西夏构兵会利用土蕃中较强之部夹攻之。初封其国西凉府首领潘罗支为防御史，后西凉为西夏所取，复用宗哥城首领角厮 为节度使进封郡王。角厮孙陇拶玄孙木征皆内附，入朝，赐姓为赵，并改汉名。”³

(4) 封赐。女国“唐初曾数次遣使来，唐乃封其女王之夫为王。其后服属土蕃。唐德宗时求内附入居中国西境。”⁴

(5) 通贡。“南州近铜鼓内附下溪州刺史田思迁亦以铜鼓虎皮麝脐来贡。”⁵

(6) 同化。“唐以后长江以北不复有蛮，同化与南徙必皆有之。”⁶

(7) 抚绥。“宋代对待南蛮多用抚绥之法，然亦略有反抗。”⁷

三、“民族史”的衰竭

(一)“悖论”的显现

19世纪的欧洲史学家（以兰克史学为代表），一方面强调史料批判和客观态度的重要，以此来批驳古代和中世纪的历史实践，但在另一方面，又与国家政权一起，以历史写作为手段，为营造民族文化和民族共同体努力。因此，他们的实践就造成一种悖论的现象：“他们通过提倡科学治史戳穿了不少古代神话，但同时他们用科学方法写成的著作。其实又构造了民族-国家的神话。

¹ 林惠祥著，《中国民族史》[下]（内部发行），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5页。

² 林惠祥著，《中国民族史》[下]（内部发行），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16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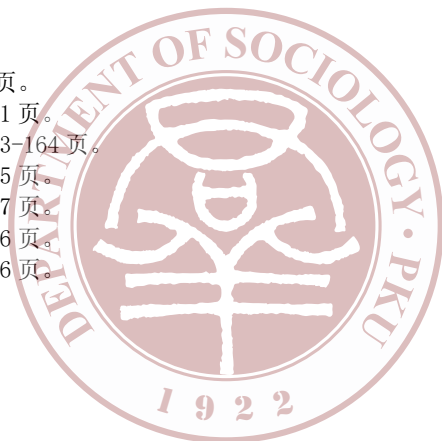
³ 林惠祥著，《中国民族史》[下]（内部发行），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163-164页。

⁴ 林惠祥著，《中国民族史》[下]（内部发行），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155页。

⁵ 林惠祥著，《中国民族史》[下]（内部发行），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197页。

⁶ 林惠祥著，《中国民族史》[下]（内部发行），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196页。

⁷ 林惠祥著，《中国民族史》[下]（内部发行），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196页。



这一现象，在世界民族史学中都有明显的表现，但具体情形又各个不同。”¹

若“地域”在民族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另一个重要角色便是“种族”。在近代中国的民族建国中，种族主义扮演了重要的作用，如中国汉族人的反满情绪。在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种族主义扮演了一个双重的角色，既可用于来抵御“他者”，又可用于与“他者”团结。如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以后便立即提倡“五族共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开始出现批评民族史的声音，非洲、亚洲等地区也有相似的现象发生。以突破传统的历史思维而言，“民族史”的写作只是其中之一。反省“民族史”在近代史学中的地位和得失、作用和影响，可窥见其在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关于民族-国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以降很多学者形成了一个共识：民族-国家是一个想像、生造出来的东西。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指出，民族-国家又有实际的意义，对近代的教育学，特别是史学，至今尚有深远的影响。与教科书的写作一样，“民族史”写作不仅要完成博大精神的传播和教育，也要创造出狭隘的民族主义。

由此可见，近代之后，历史研究潮流，尤其是“民族史”的写作，在实际操作中始终处于尴尬的夹缝中，西方人勾勒出的民族-国家的“想像”和“蓝图”，在欧洲以外的许多地区的国家建构过程中曾面临不少障碍，如一直以“天下”为世界观的中国人较难接受民族-国家的观念。这也许是所有研究亚洲地区近代化的学者的共识——为自己的国家撰写一部完整、精美、独一无二的、单一民族的“民族史”是一件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二）马克思主义阶级意识的盛行

民族和阶级是不太容易分清楚的概念。在实践中，阶级意识往往涵括民族的向度，在阶级的统辖里，民族和“民族主义”是阶级意识的强化剂。马克思主义十分注重阶级意识和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尤其在中国共产党刚成立之时的“无产阶级自决论”充分说明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继承性，“李大钊就是以阶级的语言来想像在国际舞台上的中华民族的：中国人民是一个被资产阶级压迫的无产阶级民族，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一部分。”²因此，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主张的“民族主义”不同于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家提倡的“中华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兴盛后，在1949年以后，更是在学术界占据了统治地位。“史料学派”相比之下，逐渐衰竭，只是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台湾，仍然有其影响力。

（三）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覆盖

瑞贝卡·卡尔（Rebecca Karl）分析清末时期“民族主义”时，强调了跨国联盟的必要性。卡尔由此得出结论，当时革命派“民族主义”已突破了国家范畴。如清末在日本成立的“亚洲和亲会”，是建立一个超国家联盟的尝试。因此，“卡尔从晚清政治思想当中区分出了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和‘民族的民族主义’。”³与清末革命派一样，民国末期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引进的共产主义，使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拥有了超“国家”的共产主义高度和世界视角，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第一次汇合，成为一种国际主义。在这样的意识形态背景下，“民族史”写作又有了新的视角，民族不再是“民族史”的基本单位，共产主义、国际主义扩展并覆盖了原有民族的视野，使得“民族史”改变了方向。

（四）革命的“爱国主义”的涌现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权力整合的主题，与国家振兴和独立的目标、国家认同联系在一起，

¹ 王晴佳，“文明比较、区域研究和全球化——第20届国家历史科学大会所见之史学研究新潮”，《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² Meisner, 1967: 188; [美]杜赞奇著，王宪明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³ 慕唯仁，“中国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弱国联盟”，《读书》，2003年，第12期。



尤其遭受外国势力的入侵时，爱国主义情绪油然而生。在菲利克斯·格罗斯看来，“爱国主义是一种自然情感，是个人对其故土、传统、历史、朋友——尤其是对童年朋友——和亲属的眷恋，往往也是对民族国家政治制度的赞赏，一句话，是对民族的一般文化的眷恋。”¹“爱国主义是最原初、最革命性的概念，乃是以国家为基础而不是以民族主义为基础，因为这种概念系来自主权人民，也就是说，国家是以人民之名来行使治权。”²“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关系最显而易见的表达便是世界各地的反帝国主义运动。”³

那时的“‘中国’并不是一般人所认同的基础，因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乃是地缘或血缘等较小的群体。到了20世纪，中国国家及民族主义的形成，则与列强的入侵和冲突密切的关系。这与先前的中国认同的文化建构很不一致。”⁴“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革命性”结合，使得“民族主义”走到了极点。随着抗日战争的来临，使得“史料学派”逐渐丧失其吸引力。年轻的学生不再认为埋头于故纸堆中，甚至出现了躁动不安的革命情绪。胡适的学生，史学界新秀吴晗（1909-1969）的转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社会史论战”，则是“史观学派”抬头的主要标志。之后的“民族史”主要以“革命史”“战争史”为主题，一时放弃了传统“种族”与“地域”的讨论。

结 语

“民族史”的写作发端于欧洲，其后的世界各地民族史的著述都有其共同的特点，即其发展与“科学史学”的兴起几乎同步进行。如何分析、考察“民族史”写作与科学史学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不同国家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等诸多因素。

近代中国汉人学者的“民族史”，其实质都是民族主义“史学”，也是科学主义“史学”，只不过在“史观学派”或“史料学派”等学派分类和形式上有些不同而已。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新史学》，已经是“史观学派”的一个先声。从那时的中国史学发展情形来看，胡适、顾颉刚强调史料的批判，经傅斯年的发展，导致“史料学派”的出现。有趣的是，梁启超到了20世纪20年代，转而支持“史料学派”，写作了《中国历史研究法》。像胡适一样，梁启超希图从中国的人文传统中，发掘科学的因素。他们两人都认为就科学方法而言，中国传统学问，如清代的考据学，并不落后于西方。从1920至1930年代，由于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在中国学术界的领导地位，“史料学派”流行一时，那时发表的史学论著，大都是专题研究，以考据为重点。但是，就思想意识而言，“史料学派”的学者也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革命情绪。他们侧重史料的发现和批判，目的是为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也即在科学的基础上，重写中国的历史，这与欧美的“民族史”写作，如出一辙。

在核心内容上，中国近代绝大多数汉人“民族史”家，注重中国多民族自古以来“种族”与“地域”上的“混合”与“统一”，影响了费孝通等又一代学者的思想体系，“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经常在发生混合、交杂的作用，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以说是‘纯种’。”⁵的观念被继承下来，这无论对近代国家与社会建构，还是对当代国家政权巩固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

¹ [美]菲利克斯·格罗斯著，王建娥、魏强译，《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48页。

²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84页。

³ [美]杜赞奇著，王宪明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页。

⁴ [美]王国斌著，李伯重、连玲玲译，《转变的中国》，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4页。

⁵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参考书目:

- [1]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合集·专集之四十一。
[2]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
[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
[4]梁启超著,吴松、卢云昆、王文光、段炳昌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
[5]傅斯年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6]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年。
[7]王桐龄著,《中国民族史》,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
[8]林惠祥著,《中国民族史》[上、下](内部发行),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
[9]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10]马戎,“从王桐龄《中国民族史》谈起——我国30年代三本《中国民族史》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11]慕唯仁,“中国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弱国联盟”,《读书》,2003年,第12期。
[12][美]杜赞奇著,王宪明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3][美]菲利克斯·格罗斯著,王建娥、魏强译,《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
[14][美]王国斌著,李伯重、连玲译,《转变的中国》,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15][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

【论 文】

家庭的民族特征与藏族大学生的高中学业成就¹

陈彬莉、陈 进²

摘要: 学业成就对少数民族学生参与祖国现代化事业与拓展个人发展机会有着重要影响,也是 21 世纪国家民族教育政策的关注重点之一。关于少数民族与汉族学生学业成就差异通常存在“文化差异”与“结构性因素”两种解释路径,本研究对西藏 4 所本科院校 1288 名在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来自于藏族家庭的孩子的高考成绩明显低于来自汉族家庭的孩子;相比社会阶层、城乡等结构性因素,家庭的民族身份与藏族大学生高考分数之间有显著关联。家庭民族身份反映了学生家庭的民族(相关的)文化特征,通过显性(比如,汉藏语言能力)和隐性(比如,对现代学校教育的认知)等多种路径影响子女的学业成就。因此今后在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和少数民族高端人才培养方面需要关注民族文化差异的影响,在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现实形势下,通过加强藏族学生掌握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来提高他们数理化学科的成绩,提升少数民族学生的高考成绩和拓展他们的就业空间。

关键词: 民族文化特征; 学业成就; 国家通用语言能力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我国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我国西部地

¹ 本文刊载于《思想战线》2018年第5期,第34-41页。

² 陈彬莉,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教育社会学;陈进,西藏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